

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

朱崇科 著

『
实人生』
的
象
鸣



人 民 出 版 社

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

朱崇科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惠 pphlh@126.com

装帧设计:雅思特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实人生”的泉鸣/朱崇科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

ISBN 978-7-01-010036-4

I. ①鲁… II. ①朱… III. ①鲁迅小说—小说研究 IV. ①I2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3726 号

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

LUXUN XIAOSHUO ZHONG DE HUAYUXINGGOU

——“实人生”的泉鸣

朱崇科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3

字数:417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0036-4 定价:3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谨以此书献给：

**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1881-2011)以及
曾经、正在、将要和鲁迅共振的灵魂们**

谈“化”

王富仁

2010年，朱崇科先生给我寄来他的《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实人生”的枭鸣》这部书稿，希望给它写个序言。我非常高兴，但也非常为难。高兴的是在这个鲁迅研究相当冷落却备受指摘的历史时期，朱崇科先生持之以恒地坚持着鲁迅研究，并且毫不以故意挑剔鲁迅的似是而非的毛病而显示自己的“进步”或“超脱”，反而以更加严肃的态度去开掘这种极难开掘的研究课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为难的是，我对西方当代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无知，使我感到没有资格为该书写序。对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我是早有耳闻的，也买过他的和关于他的一些书，但一本还没有读过。当时我的想法是，借这个机会好好读读福柯的书和有关他的研究著作，然后再认真地读完朱崇科先生这部书稿，即使仍然无法完全弄懂福柯的理论，到底也算长了一点见识，写起序来也不至于只说一些令人笑掉大牙的外行话。但谁知这个计划还没有付诸实行，就大病不起，差一点见了阎王。福柯的书我已经来不及看了，甚至对朱崇科先生的这部书稿也没有来得及从头到尾地细细品读，只好先天马行空地说上一些话，这是很对不起朱崇科先生的，也是很对不起读这本书的读者的，请大家原谅。

* 王富仁教授，新中国第一代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极具影响力的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汕头大学教授，曾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著述等身。

说点什么呢？因为朱崇科先生是以外国当代文化理论为基本框架对鲁迅作品进行的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研究，我就以此为题说点自己的看法吧！

毫无疑问，输入外国最新的文化、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方法对中国文学进行新的、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对于持续不断地推进中国文学研究的繁荣发展是有关键的意义的。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任何一个研究者，没有从系统外输入新的文化信息、新的文化模式，仅凭有限的文化信息及其文化模式，是很容易陷入一个固定的循环圆圈而导致自我的停滞与落后的。在这样的文化中，好像每一代人都在向前走，甚至有时走得急急忙忙，但走着走着，就又走回到原地来了。如果按照西方的耗散结构理论，这还是一个逐渐耗尽自己内部的能量而最终导致系统无序化的方式。实际上中国古代两千余年的封建文化史就是一个明证。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只能依靠外国文化及其模式的输入，更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形式输入的外国文化都会起到推动本民族文化发展的作用。在这里，是确确实实存在着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常说的“化”的问题的。

关于外国文化要中国化，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说了很多很多，但大都是那些其本意就是反对输入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人说的，而那些意在输入西方文化以改造中国文化的人反而只强调西方文化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而并不重视这个中国化的过程，这就使我们的文化研究至今仍然主要停留在晚清文化开放与文化封闭和中西文化优劣论的层面上，实质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较为完满的解决。实际上，知识分子的作用并不直接表现在对政治的态度上，而是表现在文化的实践上。在政治上，国家政治理应担负主要的责任，国家政治要有主动性，即使改革，也要国家政治根据现实情况对自己的政策方针做出新的调整。知识分子有监督的责任，却没有越俎代庖的权力，但在文化上，知识分子要有主动性，要独自上路，走在现实政治的前面，要按照文化传承和文化传播的规律各自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不难看出，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文化的中国

化才有实现的可能性,中国知识分子也才能主动积极地逐级推进西方文化中国化的进程。

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重视前苏联和弱小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英美派知识分子重视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外国文化和中国文化都不会是铁板一块的;外国文化作品的翻译和介绍,首先重视的就是忠实于原作,而不能仅仅依照翻译者和介绍者的主观愿望篡改原作的意义,但任何一个合格的乃至优秀的翻译家都会明白,其翻译的作品再精确,也不可能一点也不丢失原作的任何东西,而其译作到了中国文化的环境中,又有可能产生在外国文化环境中所不可能产生的新的思想或艺术的效果。这也就意味着,外国文化的中国化,永远要以尽量保持其异质性为标准,而不能以泯灭其异质性为主要目标,只有这样,才能起到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的作用。但是,不论我们如何努力保留外国文化的异质性,它的异质性也不可能完整无缺地保留下来,其翻译作品仍然是以中国固有文化对其异质性的最大包容度而被包容在中国文化之中,它起到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的作用,但却不会导致整个中国文化的解体。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喜欢以西方文化的代言人自居,其实这只不过是自己的主观想象而已。因为再伟大的翻译家也不会完全等同于外国文化作品的原作者;外国文化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当然首先取决于翻译者和介绍者对外国语言的熟悉和了解,但更取决于他对中国语言的熟练运用。如果说他对于原作只是一个读者,而对于中国的读者他就是一个创作者了,而对一个创作者的语言表达能力的要求,是永远高于对一个读者的要求的。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必须以固有的中国文化为基础,它起到的是重新激活中国文化潜质的作用,而不可能用外国文化完全取代中国文化。一个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外国文化的翻译者和介绍者的。

我认为,迄今为止中国知识分子对外国文化的接受,都还停留在直线性接受的层面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重视马克思主义

在西方文化背景上是怎样获取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而总是想拿着阶级斗争的武器一路过关斩将直奔共产主义；中国的民主主义者也不重视民主在西方文化背景上是怎样实际地构成了一种现实的政治体制，而只想通过民主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宣传而从天降下一个民主社会。事实证明，这都是事倍功半乃至劳而无功的做法，要想外国文化在中国文化内部起到实际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作用，必须在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实际的人生态度和人生道路，也就是说，要“化”于无形。凡是将外国文化想象成洪水猛兽或者包治百病的圣手神医的人，凡是以为依靠某种文化学说就能够拯救现实世界的人，恰恰是那些不懂得外国文化的人。部分中国的外国文化研究者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故意将自己研究的对象说得神乎其神，好像只有自己能够懂得，任何其他人都不会懂，其实这也就抹煞了自己研究活动的意义和价值。中国的外国文化研究者要以中国读者或部分读者能够听懂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将自己对外国文化作品的感受和理解更加充分地表达出来。而这个过程，实际也是外国文化中国化的过程。

外国文化需要研究，中国文化也需要研究，而当这两种研究直接结合在一起，就有了比较文化研究、比较文学研究。实际上，不论是法国的影响研究还是美国的平行研究，凡是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研究，都向我们透露着这样一种基本的文化观念，即世界上各种不同类型的民族文化，至少在其存在的意义上都是彼此平等的，并且这些彼此平等的文化又是相互有联系的。在这种文化意识的基础上，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同中见异、异中见同，即在不同民族文化的文化现象的相似性中发现彼此的差异性，又在彼此的差异性中发现其相同或相近的本质特征。通过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的研究，研究者同时更清晰地呈现了不同民族文化中的不同文化现象的特征，同时也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疏通了渠道。对于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比较而言，它同时是外国文化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外国化的过程。我认为，过去我们常说的世界文化和现在人们常说的全球文化，就是在这种广

泛而又深入的比较文化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来的，它是一种杂多中的统一，也是一种统一中的杂多，既不会是纯而又纯的西方文化，也不会是纯而又纯的中国文化。在当今的世界上，美国一些知识分子口口声声要用美国的价值观念拯救整个世界，而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也口口声声地要用中国的儒家文化拯救整个世界，这些只不过是一种文化沙文主义的狂想而已：一种思想统治一个民族的时代即将成为历史，一种思想统治整个世界的时代也绝对不会到来。那些“全球化”的知识分子应当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不断进行更加全面细致的比较文化研究，只是一味地像做国际买卖那样进行文化的推销活动是不行的。

像朱崇科先生该论著这样用西方文化、文学理论中一种具有普世性价值的文化、文学模式具体研究中国文化或文学作品的研究方式，严格说来，也是一种比较文学的研究方式，是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方式。我曾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在严格的意义上都是广义的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研究，就是因为如此。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文化专制主义传统势力的强大，使具有革新愿望的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找到支撑自己的强有力的思想支点，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在国外文化背景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就起到了这种思想支点的作用。这就是从晚清洋务派、改良派、革命派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些先进知识分子所实际采用的文化革新策略。是打破传统儒家文化价值观念的独尊地位、打破自我封闭式文化心理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也有其局限性，即当它破坏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独尊地位、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自我封闭式文化心理之后，在新派知识分子之中，又有可能形成对西方某种文化理论、文学理论的独尊心理，并以这种文化的独尊代替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独尊。虽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就提出了个性解放的问题，但其文化心理仍然常常被封闭在某种文化理念的内部，甚至连个性解放也仅仅认为是西方的思想，而不是中国人自身的自然愿望和要求。“五四”新文化运动

之后，除了在中国社会上仍然具有实际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传统之外，在新派知识分子之中则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文化理念的左翼文化阵营和以英美文化理念为核心的所谓右翼文化阵营。其共同点在于都是以在西方已经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思想为理论基点，并且都带有绝对排他的性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上的胜利，同时也标志着以马列主义为核心文化理念的左翼文化阵营对以英美文化理念为核心的所谓右翼文化阵营的胜利，此后在文化上进行的一系列斗争都是以马列主义思想清除所谓英美资本主义文化影响为目标的斗争，并形成了马列主义思想在中国大陆的绝对独尊地位，在文化心理上造成了较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绝对封闭状态。必须看到，当马列主义在中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阵营的时候，马列主义在中国文化的实际发展中是起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的，它不但标志着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已经从传统儒家文化的禁锢和束缚中挣脱出来、开始独立地面对现实世界和现实的社会人生，而且也标志着他们对以广大贫苦农民为主体的最底层社会群众生存权利的重视，而这是当时以英美文化理念为核心的所谓右翼知识分子所较少具备的，但当1949年之后，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旗帜开始清除以英美文化理念为核心的所谓右翼文化阵营的时候，当将马列主义思想作为整个社会独尊的唯一思想的时候，其意义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因为以英美文化理念为核心的所谓右翼文化阵营，同样是在摆脱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禁锢与束缚之后逐渐形成并壮大起来的一个文化阵营，尽管他们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对广大最底层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没有像当时左翼知识分子那么关心，但只要重新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场景中去，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在基本的文化理念上与真正的左翼知识分子其实是相通乃至相同的，胡适与李达的分歧不是绝对的对立。二者之间的绝对对立状态是被他们后来的那些追随者在政治权力的斗争中无限地夸大起来的。不仅如此，这些新派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斗

争,是以文化的(科学的、文学的)方式进行的,而不是用政治权力的手段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以文化的方式进行的文化斗争,不会导致任何一个文化派别的最终灭亡,而是将其从一家独尊的地位降低到能够与其他文化派别平等对话的高度,并在这种高度上找到自己继续演化发展的道路。“五四”之后的新儒家学派就是这样一个独立的文化学派,是在现代学院文化环境中重新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儒家文化学派。它像传统儒家文化一样是以将儒家文化重新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并取得在中国文化中的独尊地位为最终的奋斗目标的,但这个目标起到的仅仅是鞭策自己努力适应现实政治统治环境以求得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最大空间的作用,而永远不会实际地取代新文化而独霸现实社会文化的空间。1949年之后的历次革命大批判运动,在有限地扩大了马列主义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的同时,却更加严重地破坏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那种多元共生的文化环境。这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破坏。改革开放可以认为是中国现代又一次的文化革新运动,但在这个时候,个体的思想仍然无法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其文化革新的方式仍然是以输入外来文化革新中国文化的形式进行的。而在这时,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的输入成为中国这个历史时期文化革新的主要形式。西方当代文化理论、文学理论代替过往时代的马列主义思想学说及其文艺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研究的主要模式。毫无疑问,这种研究模式的建立,在从“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的中国文化演变和发展的历史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它也有局限性,具体表现是,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是将自己的思想寄生在西方早已成型的思想之中而获取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似乎当代西方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就是当代世界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的终极形态,中国知识分子不论在外部世界还是在其自身的意识中,还是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还是以传播别人的思想为使命,这同时也将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文化创造遮蔽在西方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的幕布之后,甚至明明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发动起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也成了西方文化的

功劳，而新儒家学派则因为“五四”知识分子普遍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将其逐出中国文化之外，在具体的文化研究中，则逐渐消解了包括鲁迅在内的整个左翼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独立贡献，而极大地夸大了英美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独立贡献，并以英美文化的代言人自居，将自己的文化活动完全纳入到英美文化传统之中去。但是，我认为这仍然不能完全抹煞这种研究模式在中国文化研究中的积极作用，因为它的这种局限性并不是无法克服的。克服这种研究模式的局限性的方法有二：

一、不把西方现成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作为研究的标准，而仅仅作作为具体研究活动的入手功夫，当进入实际的研究过程之后，则要充分发掘研究对象已经呈现和未曾呈现的价值和意义，并将研究对象当做一个独立的对象和个体，而不是这种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的产物。必须看到，世界上任何事物的价值和意义都是特定的，绝对不会成为各种不同价值和意义的大杂烩，也不会完全为任何其他事物的价值和意义所代替。鲁迅的《狂人日记》，谁都没有权力要求它必须符合西方哪个文化理论、文学理论的要求，但我们可以从西方文化论或文学研究方法出发，对它进行具体的研究，但不能成为衡量《狂人日记》价值和意义的标准。《狂人日记》的价值和意义是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文学史的具体背景上得到或显或隐的呈现的，研究者应当在其特定的研究角度上进一步接近对它的整体研究，而不应当仅仅满足于将西方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标准套用到《狂人日记》身上了事。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将西方文化理论、文学理论或文学研究方法中国化的方式。朱崇科先生这部学术论著是以西方当代文化理论为基本框架的，但他并没有把这个框架当做裁判鲁迅小说优劣的价值标准，而只是将其作为研究的入手方式。它发掘的是鲁迅小说自身的话语形构，所以也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学者式的傲慢，是成功地避免了这种研究模式常有的局限性的。

二、在用西方模式分析研究中国文化作品的时候，必须注意剪裁剩下的“下脚料”的价值和意义的分析和研究，并将这些分析和

研究加入到自己的研究整体之中去。因为任何西方的理论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上总结出来的最基本、最常见的文化结构形式，它不是“语言”，而是“语法”，而任何“语法”都是无法完全代替“语言”的。而越是中国的具有独创性的文化和文学创造，越是无法完全包含在这种一般性的理论概括中。所以，当我们运用西方现成的文化模式分析研究了中国文化作品之后，要特别注意有哪些东西仅仅在这种模式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而这恰恰是从一般进入特殊、从世界普遍性进入民族独特性的开始。在过去，我们好用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研究鲁迅小说，这并无不可，但在用西方现实主义理论充分揭示了鲁迅小说的某些特征之后，不是明明剩下了很多东西没有在这种分析中得到说明吗？不是像裁衣服一样剩下了很多被剪裁下来的“下脚料”吗？不难看出，正是这些“下脚料”，体现了鲁迅小说与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的根本差异，只有将这种差异也加入到自己的研究之中去，这种研究才会成为更加充分的研究。否则，西方的文化理论与文学理论就真的成了像科学定理那样的文化教条了。显而易见，朱崇科先生这部论著在这个方面注意得还是不够的。我总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的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面前不妨再洒脱一点，甚至，还可以再傲慢一点。不要那么拘谨，不要那么中规中矩。世界上所有文化的理论和文学的理论都是用于交流的，而不是仅仅供人学习的。交流，没有一个谁高谁低的问题，只要尊重对方的人格，尊重对方的劳动，就可以了。不妨放得再开一些，不妨把话说得再大胆一点。这对于我们鲁迅研究者，似乎更有实际的意义——传达出鲁迅作品自身所具有的那种文化品格。

2011年8月8日

于汕头

目 录



CONTENTS

上编 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

绪论 话语形构与鲁迅小说 / 3

第一章 身体/空间 / 13

- 一、鲁迅小说中的身体话语 / 13
- 二、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型”话语 / 24
- 三、鲁迅小说中“月”的话语形构 / 36
- 四、鲁迅小说中“路”的话语形构 / 48

第二章 人生/实践 / 65

- 一、鲁迅小说中的儿童话语 / 65
- 二、鲁迅小说中的青年话语 / 78
- 三、鲁迅小说中婚恋话语的悲剧性机制 / 88
- 四、鲁迅小说中的贱民话语 / 100

第三章 文化政治 / 114

- 一、鲁迅小说中的癫狂话语 / 114
- 二、鲁迅小说中“吃”的话语形构 / 128

三、鲁迅小说中的村镇政治话语 / 139

四、鲁迅小说中的丧葬话语 / 151

第四章 捆绑哲学 / 165

一、鲁迅小说中的医学话语 / 165

二、鲁迅小说中的经济话语 / 178

三、鲁迅小说中的八卦话语 / 191

第五章 叙事话语 / 204

一、鲁迅小说中的环形营构 / 204

二、鲁迅小说中的启蒙姿态与“自反”策略 / 217

三、鲁迅小说中的“小说性”话语 / 228

结语 / 250

下编 点视鲁迅

第六章 反思“新编” / 257

一、历史重写中的主体介入——以鲁迅、刘以鬯、陶然的“故事新编”为中心 / 257

二、走向狂欢——鲁迅《故事新编》新论 / 269

第七章 比较细读 / 304

一、“详细”的“永固”——论鲁迅生前身后对郁达夫的五次回访 / 304

二、“肥皂”隐喻的潜行与破解——《肥皂》精读 / 326

三、为了反抗与也是反抗——鲁迅与阿尔志跋绥夫笔下的人物性心理描写比较 / 335

四、比照周氏兄弟——“3·18事件”的文本连缀 / 343

第八章 他山之石 / 351

一、现代性与“狐狸”的智慧——评李欧梵著《铁屋中的呐喊》/ 351

二、文学空间中的意识形态观照与开创——评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 360

三、后殖民视角与错置的“去中国性”——评王润华鲁迅论的一种观点 / 365

四、“小说”的野心与虚构的魅力——评王德威《小说中国》/ 371

参考书目 / 379

一、中文书目 / 379

二、英文书目 / 394

后记 / 398

上 编
